

排除异化：实现劳动教育幸福的条件与途径

张科源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劳动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可以被磨损的东西。这一点告诉教育工作者，要使工作的乐趣最大化，同时也要把它的磨损减到最低。关于后者，学术界已有不少的研究；关于前者，学术界很少讨论。在实质上，实践“最大限度”的工作就是抛弃劳动教育的“异化”，从而为实现“劳动教育”的快乐创造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抛弃劳动教育的“异化”，实际上是对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前的“异化”和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异化”。因此，实现劳动教育幸福的途径有两个：第一，防微杜渐，第二，拨乱反正。特别是，前者强调了教师对异化劳动的回避，而后者则强调了对教师的纠正。

【关键词】：劳动教育；异化；快乐

Eliminate the alienation: the condition and the way to realize the happiness in labor education

Zhang Keyua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aoning Dalian 116024

Abstract: Labor is a pleasure, and something that can be worn out. This tells educators to maximize the joy of work and also to minimize its wear and tear. In relation to the latter, the latter. In essence, the practice of the "maximum limit" work is to abando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so as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appiness of "labor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abandoning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s actually the "alienation" before the practice of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ways to achieve labor education happiness: first, to prevent small problems, and second, to put things right. In particular, the former emphasizes teacher avoidance of alienated labor,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correction of teachers.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alienation and happiness

何云峰《劳动幸福论》认为，“劳动”是一种双重属性，它既能充分地反映人的价值，又能肯定人的类本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幸福和幸福；另一方面，劳动也会给的身体和精神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总之，劳动是快乐的，也是可以磨损的。卢中平认为，学生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是最根本的工作方式，也是一种双重性质。这一点告诉教育工作者，要使工作的乐趣最大化，同时也要把它的磨损减到最低。对前者而言，劳动教育可以产生快乐，也可以转化为快乐。当前，有关劳动教育幸福作用的研究多以“快乐最大化”为研究对象，对劳动的可折损性最小化的研究较少。实践“减损”，实质上是要消除劳动教育的“异化”。异化的劳动与劳动的异化早已脱离了快乐的轨道，使人痛苦、折磨、强迫、牺牲，即“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最终导致人与快乐的分离。因此，教育工作者应适时地抛弃这种异化现象，为实现劳动教育的快乐创造有利条件。

一、劳动异化与异化

在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和发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不同程度的异化和异化。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有什么联系？

从概念意义上说，“异化”与“异化”之间有着不可忽略

的区别。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很多学者（毛勒堂，2020）常常将这两个词混用，主要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上的不同含义，比如“母亲”和“妈妈”，而不是“和”和“与”。其他的学者则比较直接，把这个单词放在一个单词的后面。因此，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在概念运用的背景下，其含义应当是：马克思对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异化性质的揭示（徐建君，2018），具体表现为劳动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与劳动者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很明显，这些异化的表现并没有在劳动教育的实际活动中得到体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马克思的“异化”与劳动教育的异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它的内涵是开放的，是无限的，是有强烈的时间和空间的，并且由于在教育领域里的劳动和工作场所的工作有着本质的差别。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也有其根本不同之处。因此，在劳动教育实践中，“异化”现象和马克思的“异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借用这种观念的原因在于两者有着同样的内部逻辑，例如：身体的伤害，自由的剥夺，尊严的漠视。这也是为什么“异化”一词在学术界仍然被许多学者所采用的原因。有的学者从目前的劳动教育状况中，发现了“劳”强、“劳”强、“教”弱、“劳”与“教”分离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教”。当然，也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并尝试用“畸变”这个词语来取代“异化”。

如檀传宝(2020),从实践层面对劳动教育的失真进行了诠释,从而找到了一条回归起点的途径。反正,在借鉴马克思“异化”的思想时,必须明确二者的异同,特别要注意忽略二者的根本区别。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和联系。众所周知,在三段论的推理中,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假设的假设是真实的,第二,推导的形式是有效的。马克思作品中的“异化”与“异化”在劳动教育中的相似之处,就像是共享了一种高效的推理方式,只不过其主要的前提是不同的。因为大前提不同,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借鉴马克思作品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释。从词组的种类上看,“异化劳动”是一种偏正的词组,“劳动”为中心,“异化”为定语,因此,“异化劳动”的重点在于劳动的性质、状态。同样,“劳动的异化”也强调了“异化”的进程和行为。不难看出,前者本质上已被界定为异化的劳动,而后者则不一定是异化的,也许仅仅是表现出了异化的倾向和迹象。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异化”只是矛盾的一个次要的部分,而不是一个主要的矛盾,不然就会变成异化的劳动。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在劳动教育实践中没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利,“被”劳动的现象很多,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学生能够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骄傲,这是劳动教育中的一种异化现象。再比如,教育工作者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手段,让犯错误的学生去打厕所、擦黑板、倒垃圾,这种行为就会直接地剥夺劳动中的快乐成分,从而使它变成一种耻辱,这种劳动就是一种异化的劳动。然而,我们也要时时注意把矛盾的小的部分转变为大的,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对劳动的异化进行适时的纠正,避免变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产生质的变化,使经过精心策划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变为异化劳动,导致劳动教育和幸福的分离。

总之,要克服劳动教育的异化,必须从预防和纠正两方面着手。具体而言,劳动教育是在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开始前,教育工作者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全面的考虑,对劳动教育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防止异化的劳动侵入,从而为劳动教育的起点和终点创造条件:劳动教育是教育者在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中及时克服、矫正劳动的异化,从而为劳动教育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二、防患于未然:教师对异化劳动的回避

《礼记·中庸》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否则就会失败。”教育工作者采取预防措施消除异化劳动,有助于避免劳动教育陷入不幸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措施要比矫正措施容易得多,因为在这个时期,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计划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处于萌芽阶段的计划是非常有弹性的。相反,计划一旦制定好,执行起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比较困难的是,在劳动教育实践中,

异化劳动的表现比较不易被觉察,特别是在不同的劳动主体之间,个体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就增加了对异化劳动的甄别难度。

从“起点幸福”和“过程幸福”两个方面来看,“起点不幸”和后面的“过程不幸”。它是指“起点不幸”和“过程不幸”的劳动教育。可以说,劳动的异化是导致劳动教育走向不幸的原因,这就像一开始就将劳动教育视为一种“惩罚的工具”,无论教育工作者在劳动中给予了多大的自由、民主、尊重等因素,都会导致劳动教育难以促进学生的快乐。为了避免“起点不幸”,教育工作者必须对其进行及时的预防性的防范。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劳动教育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关注。

①劳动,是一种处罚的工具。为防止体罚或间接体罚对学生造成的损害,又能达到惩罚效果,一些教育工作者常常采用“以劳代罚”的教学方法。更有甚者,将劳动教育与“劳动改造”等同起来,如学生迟到、早退、作业不做,就会受到擦洗黑板或清洁教室一星期的惩罚。②劳动是一种训练的方式。教育工作者忽略了学生的身体抉择和主观能动性,过度强调了劳动训练的外在力量,试图通过体力劳动来限制、监控和控制学生的一举一动,从而维持所谓的老师的权威和教室的秩序。③为获得利益而工作的劳动。具体而言,学校通过劳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资金,而教师则希望通过劳动教育来获得职称评聘、绩效考核、评优,而劳动教育则是为了“收获表扬、优待和偏爱”。④作为一种处理工作的工作。劳动中的“异化劳动”主要体现在课堂上“听”劳动,课外“看”劳动,网上“玩”劳动,“考”作业,劳动劳动等缺乏“身体力行”。也就是所谓的“去身体化”。的确,“身体”也有“听”“看”“玩”“考”等,但他们的参与大多是“颈脖”之上的躯体,“颈脖”以下的躯体很少参与。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流行的“校园劳动show”。由此,劳动教育就变成了一项“观光式”的休闲活动。

首先,教育工作者应该坚定地反对把劳动当作一种惩罚的工具。可以说,劳动的异化给劳动教育的快乐带来了先导性的伤害。根据斯金纳的可操作性条件理论,处罚是指在生物体作出一定的反应之后,适时地提供一种令人反感的刺激,从而减少了不良行为的发生。一旦教育工作者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学生的工具,那么,教育工作者就会将其作为一种“厌恶刺激”来使用。久而久之,就会让学生产生厌恶、抵触的情绪。这样,教育家就把劳动的快乐属性完全掩盖了,把它变成了一种“恶”。正如“原罪论”,无论教育工作者怎样仔细地规划劳动教育活动,学生们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逃避劳动”的心理,因为在他们的认识中,参加劳动就是惩罚和改造。这和“劳改”(一种主要的改造方法)的心理逻辑是相似的:一种是犯了错误,另一种是有罪。因此,对劳工的豁免权也意味着无罪和无罪。当然,有些老师把这种“异化”的工作放在“工具箱”里,就是因为这样的工作方式有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们

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把劳动教育作为一种快乐的工具,而把劳动教育作为一种“四育”手段,完全失去了“自我”与“四育”的“并举”。所以,教育工作者要明确劳动的正向性质,从根源上防止劳动的异化,并通过表扬和奖励等方法,使劳动成为一种愉快的激励,促进学生的劳动和劳动。另外,教育工作者也应公开表扬和鼓励一些热爱劳动、愿意劳动、会劳动、会劳动的学生,以此来维持和扩展“正强化”的意义和价值。英国著名的教育家洛克在谈到孩子们的名誉时说:“公开地夸奖孩子,让他们互相传播,孩子们就会越来越重视他们的荣誉,他们也会努力保持他们对他们的赞扬。”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对“劳动羞耻”的认识,从而使他们树立起“劳动光荣”的正确观念。

其次,要小心地处理被当作是训练方法的劳工。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说:“规训,就是通过许多手段,如规则或纪律,使人类能够仔细地掌握身体的活动,以此来克服人类的一切能力,并把它们变成一种服从和效用的关系。”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双重的权利技术,即训练、监视、控制、干预、限制肉体 and 创造知识。实际上,规则到处都是。可以说,人是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是,他们总是被训练的束缚所束缚,而劳动的教育,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训练。比如,在劳动教育方面,学校制订了劳动教育的相关法规和纪律规定,使每个学生的劳动行为都有一个规范,使每个学生都能遵守劳动法规,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教育工作的有序进行,才能不断地塑造、约束和规范学生的劳动行为。在这方面,对劳动教育进行规范也具有积极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学校劳动教育的有效运作。然而,由于“规训”对“自由”的制约,很多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对它进行了批评。从这种意义上说,规训实际上是一种对人进行规范和培训的过程,其目标是使人成为一个遵循某种准则和准则的抽象对象。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和规训的有效控制,使得教育工作者往往将规训视为一种常规的劳动教育手段,导致规训的困境扩大,挤压了学生的自由,导致训练与训练之间的失衡,导致规训的方向越来越偏向于规训。比如,一些教育工作者为了维持所谓的“秩序”,把平日里好动的孩子放在劳动实践中,并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以此来约束和监督他的行为。一般情况下,真正的劳动教育常常是在规范和自由之间维持一种必需的紧张关系,在秩序和人格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因而,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劳动,并对某些不能充分发挥其劳动主体性的规训要素加以积极的扬弃。

此外,严格地将其看做是获取利润的工具。人类是一种理智的生物,而人类的行为又以趋利避害为出发点和归宿。英国知名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以“理性人”为基本出发点,提出了“经济人”这一概念。斯密相信,自我利己是人类的本性,它是大自然赋予的,因此,我们不能对追求私利的行为加以限制。这说明劳动教育中的各个主体利用劳动教育谋求个人利益

是自然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人的理智天生就有缺陷和缺陷,否则,人就会成为“神”,无所不能,所以,人在认识和判断层面上犯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学者(刘太刚,2016)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大部分人在做出利益抉择时,都会遵守一个基本原则:面对同样数量的利益时,人们会倾向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得比长期看得更重,而不看别人的。”在这种逻辑之下,当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冲突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短期的收益;当个人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自己的利益。法国哲学家萨特有一句经典之作:“他就是地狱”,这意味着,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人看来,他就是他,而他的另一个和他自己处于对立和敌对的状态。尽管该命题带有“唯我论”的色彩,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但它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在一定的利益总量下,人类的理性会促使个人与他人发生冲突。“内卷”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别人很可能被当作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获得好处的工具。德国哲学家康德对此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开始高喊:人类才是最终的目标!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区别对待劳动教育的个人牟利作用和劳动教育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之间的差别,把劳动作为牟利的工具加以严格把关,以防止出现“鱼目混珠”的情况。必须指出的是,劳动教育成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本质是把学生作为主体,而被教育者视为实现个体目标的工具和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被异化的劳动剥夺了人的主体价值。

最后,把工作看作是一种对工作的完全转变。真正的劳动教育离不开学生的身体。所有的劳动教育都是因为学生们的身体素质不够好,敷衍了事。因为肉体是快乐的载体,一旦肉体崩溃,或者失去了自由,那么即使快乐就在眼前,我们也很难抓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们的手中溜走。这一点和约翰·洛克关于“健康之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体”的精辟见解是一致的,洛克甚至认为“健康身体”和“健康精神”都是“世界上的快乐的一个简单而全面的描述”。他坦诚地说,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灵魂,那么他什么都不想要,而且,他强调,如果失去了这两样东西,那么,再多的东西也是白搭。洛克的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一、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灵,是人类生活中的快乐。第二,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都离不开,不然,通过其它需要的满足来达到快乐的行为都是无用的。第三,健康的身体是健康的灵魂,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灵魂就会失去支撑,人生的快乐就像是一座没有根基的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人生的快乐需要通过肉体来传递,而劳动教育的快乐也离不开肉体的参与。然而,由于“扬心抑身”的坚韧传统和“重智轻劳”的教育观念的束缚,“劳动之苦”的刻板印象和被无限放大,导致了劳动教育与实际劳动的距离越来越远,比如现在频频发生的“观光式劳动”“听课”等,都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学者檀传宝(2020)认为,这样的“观光劳动”,就

像“少爷小姐”一样，只会让人觉得轻浮、沉重、缺乏对劳动的基本尊重，与真正的“劳动教育”毫无关系。这种“去身体化”的劳动不但使劳动失去了通往快乐的途径，也使其失去了其快乐的意义和价值，使其与快乐分离，最终成为陌生人。为此，教育工作者应从根本上改变“去身体化”的劳动方式，以“以人为本”为起点，以“以人为本”为根本，以“具身性”为指导，以“具身”为指导，以“以人为本”的具身劳动实践活动为根本。

三、纠偏：教师纠正劳动的异化

在“异化劳动”以极快的速度跨过教育主体精心设置的“防线”后，“起点不幸”的劳动教育就会演变成“过程不幸”。“起点不幸”是导致劳动教育不幸的原因，而“过程不幸”又是其不幸的表现。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劳教不幸现象，实质上是一种“过程不幸”的直接反映。由于“过程不幸”比“起点不幸”更为明显，而且与劳动教育的具体实施有直接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常将其不幸的劳动教育经验归咎于受试者的“过程不幸”经验。“起点不幸”是由受试者“思”来认识的，“过程不幸”是由“行”来认识的。“思”是一种很有预见性、统摄性、抽象性、灵活性、目的性和迁移性的特点，但是，这种思维终究不如亲身体会来得深刻，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欲知梨之滋味，须亲自品尝。”

劳动教育的“起点幸福”是一种静态的劳动教育，它的“起点”就是劳动教育的准备阶段，劳动的内容、环境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教育的快乐作用的实现，“起点不幸”在劳动教育的快乐作用中起到了“完成时”的作用。相比之下，“过程不幸”是一种动态和生成的相对缓慢的“进行时”。因此，“起点”的幸运和不幸，教育工作者们只能在全局中把脉、把握、把关，而“过程”中的幸运和不幸，则是由教育者在细微处体会、体认、体悟的。而劳动的异化又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的“进行时”。与二者相比，“异化”是指“异化”的劳动，而“异化”则是“异化”。前者着重于“异化”的进程，可以说是“异化”；后一种强调“异化”，可以被解读为“已被异化的劳动”。因此，“起点不幸”主要侧重于预防，而“过程不幸”则侧重于纠正。

根据上述认识，在教育场中的劳动异化，是指在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中，从证实类本质的劳动向压制类本质的活动转变。换句话说，劳动的异化是试图消除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造成“当人利用人类的功能时，感觉自己只是一种动物，因此，动物的事物就变成了人类的物品，人类的物品就变成了动物的物品。”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的一段经典之作，以加深对劳动异化的理解。当前，在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中，学生体会到了“自我不肯定，自我否定”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快乐，而是非常的痛苦；不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身体，而是用来折磨自己的身体。”在此基础上，教育工作者对劳动异化进行适时纠正，即回归到非异化劳动教育的实践之中。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

从认识劳动的本质和典型特点入手，不断地观察、发现和把握学生的劳动行为，从而及时地消除这种不良的影响。

当前，我国的教育领域的劳动异化具有如下特点：①受迫。大学生参加劳动教育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而非个人意愿。在“被迫性”的背后，反映出了工作的乏味、机械、重复，以及缺少意义。比如，一些教育工作者所制定的劳动教育制度、规范，总是与实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甚至在综合评价中给予了很高的比例。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样做很正常，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②受人支配的性格。在劳动教育的全过程中，大学生的自主意志和自由意志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教育的设计和评估都缺少了学生的参与；也就是说，在劳动教育实习的前期准备和实习后的评价和反思环节，都是由教育工作者来完成的。这一现象可以归结为“掐头留中间”。也就是说，“两头”是教师的主场，是教师的地盘，教师享有绝对的自主权；“中间”是学生的主场，也是“留给”学生的地盘，学生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很明显，“留”的主体是老师，学生只是“留”的一部分，就像封建的官僚体制一样，学生是“中间”的“一把手”，而“一把手”的任命和任命，最终还是要看他们的意愿。另一方面，虽然“中间”是学生的活动场所，劳动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学生来完成，但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场所、环境、设施、任务、时间、地点、方式和规范的要求都是由教育工作者自己制定的，学生们只能在教师的范围内活动，即使有一定的自由，也会自己的工作带来不便。③无趣。在劳动教育实习中，中学生必须参与枯燥、枯燥的工作。这种类型的课程，与学生的兴趣无关，与学生的生活格格不入。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单调、枯燥，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形式上，其表现为简单、机械、重复，且缺少与之对应的挑战和满足感。比如，一些职业学校将劳动教育看作是牟取利润的手段，安排学生到工厂里去去做流水线的工作，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伤害。④工作强度。从肉体的观点来看，任何劳作的快乐作用都是以人体所能承受的限度为基础的，尤其是劳作所消耗的体力要比肉体的自愈能力和程度低。如果工作的强度和工作量超出了人体自身的自我恢复能力，那么，劳动就成为了“生活负担”，对学生造成了痛苦和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自身的保护本能的作用，大学生很容易就会走向抵触劳动、逃避劳动、假装劳动。

首先，要尊重劳动者的意愿，从而使学生产生工作的愿望。尊重意愿是先决条件，而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关键。一种是，教师不能强迫学生去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马克思在谈到“强制劳动”时，曾说过：假如我们所知的最大的乐趣是自愿性的生产性劳动，那强迫劳动就是强迫劳动，是一种最残忍、最侮辱人的酷刑。这一点向教育工作者们指出，强迫劳动是威胁和破坏劳动幸福的最大杀器和根源，它使学生的劳动变成了不经受刑人同意的劳动改造，使他们感到羞辱和厌恶。另一方面，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是因为，激励劳动者的劳动

意愿既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又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潜力。怎么催动？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现有的激励措施主要是从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劳动氛围等方面进行的。通过细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策略基本上遵循着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发掘劳动的乐趣，满足学生的精神需要。这就提示了教育工作者必须“两条腿走路”，不仅要挖掘和凸显劳动的正面属性，还要在尊重学生的心理需要的同时，适时地满足他们的各种心理需求。

其次是对劳动自由的保护，从而激发了大学生的创造性劳动。劳动自由是实现劳动者快乐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劳动创造的必然途径。关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劳动自由是劳动快乐的基本属性（周书俊，2020）。教育领域的劳动自由是指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自由选择、支配和展开其劳动行为的自由。劳动自由可以使学生的劳动主体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使其产生劳动的潜力。马克思把自由劳动看作是一种“第一需要”，它克服了异化，符合人的本质，是一种最高形式的劳动。根据马克思关于“自由劳动的国家”的观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自由劳动”在这里的含义，主要是指“劳动自由”。只有自由地从事劳动，才能充分地释放个人的情绪，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充分展示个人的价值，积极地提升个人的个性，使自己在劳动中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因此，有学者（何云峰，2018）提出了“只有自由劳动，才能使劳动的快乐最大化”，并认为，自由劳动不是随心所欲的，否则就是“任性”，不能随心所欲，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是在逃避工作。真正的自由劳动既是一种快乐的劳动，也是一种更多的投入，既是一种满足主观意志的劳动，也是一种享受和快乐的劳动，它使主体的价值和类本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劳动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工作，而是要把工作放在“怎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工作”上。此外，劳动自由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它脱离了外部的限制和束缚，它的中心特征是，劳动应当是目标而不是工具。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要把劳动教育作为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工具，因为劳动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把劳动教育降级为一种手段的尝试，就是背离和背离了推动人类全面发展的教育意旨。劳动教育虽然还有其它的作用，例如劳动改造，但它们并不是其本源的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一以贯之地将劳动教育作为其最终目标，才能彻底消除劳动的异化，使学生得以充分、自由地从事劳动教育。尤其是，劳动自由并不意味着学生的工作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其实，必需的劳动秩序和劳动纪律是保证劳动教育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否则，很有可能使其失去其意义和价值。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劳动纪律和劳动秩序的作用，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限制、约束和约束学生的劳动潜力，而是为了释放、激发和激发学生的劳动潜力，从而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劳动创新。

此外，还可以发掘劳动的兴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喜欢玩是人类的本性，因为它的乐趣和它的非功利性。培养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保证劳动教育顺利进行的有效保障。劳动的激情常常和兴趣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如果是一种学生感兴趣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工作热情就会更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劳动兴趣是最积极的一种心理因素。当学生对劳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他们就会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负担，从而有助于学生获得较好的劳动教育。因此，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附中“以劳动为核心，以兴趣为核心，以兴趣为导向，双管齐下”，激发了学生的劳动积极性，使他们对劳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家庭分担、未来就业、志愿服务等内容设置丰富的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劳动兴趣；同时，利用学校宣传栏、班级群、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对劳动观、劳动幸福观进行宣传。学校的这一举动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启示，即“通过劳动”和“在劳动中”来激发劳动热情和劳动兴趣。这说明，学生对劳动的兴趣不但是天生的，而且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激励，使其成为学生的劳动行为的内在动力。此外，大学生的劳动兴趣很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学校里的劳动文化。因为，校园是劳动文化的沃土，它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校园劳动文化中，营造“爱劳动、会劳动、懂劳动”的劳动氛围，从而对学生的劳动兴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意见》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劳动文化”作为开展劳改工作的四个主要方式之一。为此，教育工作者应通过营造和强化校园劳动文化的环境，使其具有引导、激励、激励的功能，激发其劳动积极性，激发其劳动积极性。以新昌县沙溪镇董村中心小学为例，巧妙地将语文、数学、自然等学科结合起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小发明、小发明，让学校成为“科技园”“科研实习基地”，让学生在劳动的同时，也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他们的研究能力。

最后，对劳动强度进行调节，从而保障了学生的劳动安全。这里的工作强度，并不是指工作的强度，而是指工作的数量和工作的工作量。此外，还应考虑到各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与其劳动承受能力之间的差异。由于单纯劳动工作的强度问题，在劳动教育实习的前期就已经经过了工人的精心考虑，精心设计，严格把关，基本解决了。因此，劳动的强度问题就是整个学校生身体所承担的工作负荷。这种工作的负荷，除工作的强度外，还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①工作时间内的强度。在理想的设计中，学生所分配的劳动的总量往往与学生的劳力耐力相适应，然而，一些人却抱着“多、快、好、省”的心态，试图通过减少劳动时间来达到既定的工作负荷，从而使单位工时的劳动强度超过了学生的体力。为此，教育工作者积极引导学生劳逸结合，在保证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劳动素质。②各组织之间的劳动强度。“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差别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特征。同时，不同的人也

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每个人的工作能力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教育工作者所设计的工作强度常常会考虑到“一般性”的问题,比如学生的年龄特点,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很难对受教育者进行全面的关注,从而使其“特殊性”成为一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殊性”,对其工作强度进行动态的调节。③劳力的大小与工作方式有关。正确科

学的劳动方式有助于降低劳动的强弱,而不科学的劳动法规又会使劳动的强度增大。这和学习要讲究方法、策略是一样的。教师要正确、规范、科学地进行劳动教学,纠正错误、不规范、不科学的劳动方式。从而使学生避免因劳动强度过大而造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从而保障他们的劳动安全。

参考文献

- [1] 何云峰. 劳动幸福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106.
- [2] 扈中平.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对当下劳动教育的启示 [J]. 教育研究, 2020, 41(12):31-39.
- [3] 童宏亮. 生命幸福: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终极旨归及其行动逻辑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7(04):163-171+230.
- [4] 毛勒堂. 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及其当代启示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01):30-38.
- [5] 徐建军, 杨国辉.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的三维释读 [J]. 求索, 2018(06):28-34.
- [6] 顾海良.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48.
- [7] 余晖, 刘晓鹏. 解构与纾解: 劳动教育的异化与回归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1(03):46-53.
- [8] 檀传宝. 劳动教育论要: 现实畸变与起点回归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57.
- [9] 赵荣辉. 劳动教育及其合理性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49.
- [10] 陈宝生.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 [N]. 人民日报, 2020-03-20(012).
- [11] 张大均. 教育心理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106.
- [12] (英) 洛克. 教育漫话 [M]. 杨汉麟,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46-47.
- [13] (法) 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248.
- [14] 徐冰鸥, 孟燕丽. 学校教育中学生身体的在场、规约与解放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1(06):107-114.
- [15] 曾天山, 顾建军. 劳动教育论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0:362.
- [16] 刘太刚. 城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制度设计与抉择——构建带免费续期面积的累进制缴费续期制度 [J]. 求索, 2016(07):12-18.
- [17] (法)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 [M]. 林骥华, 等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326.
- [18] (德)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M]. 苗力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48.
- [19] (英) 洛克. 教育漫话 [M]. 傅任敢,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1.
- [20] 李达. 《实践论》解说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1:1.
- [21] 侯才. 赫斯《金钱的本质》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J]. 学术月刊, 1988(10):22-32.
- [22] (德)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54.
- [2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432.
- [24] 周书俊. 劳动自由是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01):39-46.
- [25] 吴瑞敏. 财富与时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D].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102.
- [26] 方少文. 做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先行者 [J]. 中国民族教育, 2020(06):45-46.
- [27] 钟义见. 校园变成了科技园——浙江省新昌县沙溪镇董村中心小学劳动教育纪实 [J]. 教育, 2010(31):24-25.